



## 第五章 結論

台灣由荷據、鄭氏、清領到日治時期，甚至國民黨時期，長期處於外來政權統治之下，因此，政治對台灣人的影響特別深。因為，每一個統治者，都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辦法透過政治控制的方式，小由生活、教育，大由政治、經濟的控管，把台灣人放在他的控制下，形塑出他們所要的樣子。因此，每一個外來政權都在台灣留下了一些影子。也因為如此，政治對台灣人的影響特別深。清朝是這樣，日本是這樣，國民黨也是這樣。所以，政治權力對台灣人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

在日治時代，有較為多數的台灣女性開始受新式教育，雖然日治時期的教育制度也充滿了殖民政府的意識型態，但不可諱言，這個時期的教育，打開了台灣女性的眼睛，也為她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同時，在新式教育底下，塑造了一群有自主意識，異於傳統的新女性。

本論文以兩位出生在日治時期的本土新女性為撰寫對象，由她們的出生與家世開始探討，她們的自主意識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受到啟發和發展。順著她們的生命歷程，藉著教育、婚姻及職場經驗，對她們的自主性的發展。不過，由於她們倆人都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生命史橫跨日治時期與戰後國民黨時期。因此，政治對她們在人生過程中的影響非常大。因為，這兩個政權都是很強勢的政權，用很粗糙甚至蠻橫的方式，將整個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巨細靡遺地置於其影響之下。因此，除了透過她們的生

命歷程討論她們女性自主意識的形成之外，更扣緊她們一生中，統治者對她們有形與無形的影響，以及在相同的政權影響下，她們有什麼相同與不同的應對，以及她們的反應產生了哪些相同與不同的結果。重要放在她們兩人在日本和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經驗。

楊千鶴和許世賢在日治時期，都出生於家世背景良好的家庭。她們都在豐沛的母愛中長大，使她們在成長過程中，都培養了一定的自信。因為家庭環境優渥，她們倆都有會接受新文明的洗禮，在教育的過程中，更發展她們的自主意識。

論及政治經驗，日治時期最重要的政治經驗是在求學與職場中所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經驗。她們在求學與職場上，受到殖民者來自制度及種族、族群等等不公平的對待，她們如何在這過程中提出挑戰同時保有及發展出自我。日治時期，日本有系統地推行一套新式女子教育，儘管日台間教育體制存在著差別待遇，但已大大改變台灣傳統婦女的視野。當時整個教育體制都在殖民政策底下被操控、規訓與管理。因此，不管願不願意，只要是在日治時期受教育，意識型態勢必受整個殖民政策所操控。甚至，整個制度的設計，就是要使被殖民的台灣人成為次等公民，例如：小學校、公學校的設計。另外，對於女子的教育，透過教科書，把女子教育規範在培養孝順、勤儉、順從、仁慈等美德上，用以形塑符合殖民政府需求的女性。除了以上的主流價值觀之外，女性還必須學習另一套「次價值觀」——輔佐男性，犧牲自我。

楊千鶴和許世賢在新式教育體制下，開啓了她們對自我主體的追求並且在自我社會位置中對性別文化批判意識的誕生。同時在新舊夾雜的教育體制下，培養了新的身體與精神。

在學時期，除了制度上的不公、教育內容的限制外，日本同學的嘲笑與歧視，在在使台灣人矮化，並使台灣人失去主體意識，被日本人次級化。但是楊千鶴與許世賢兩人都能為同胞仗義直言，這樣的個性也潛藏她們日後從政的因子。在日治時期的教育，雖然有許多限制，但卻為台灣婦女打開一扇對外的窗口。而她們也都由這扇窗，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教育，對一個傳統婦女的成長與自我意識的養成，佔有重要的地位。

受教育的過程，讓她們的腳和心靈鬆綁。首先，她們可以離開家，也突破了傳統人際關係的藩籬，發展出一種傳統宗法以外的人際關係，也使她們可以由充滿束縛的父權家庭出走，讓她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可能性。她們在求學的過程中，在種種不公平中，培養了自主意識。同時，巧的是，她們都在體育課這原屬於男性的課程中，表現非常好。從求學時代開始，她們兩位就一直在跨越男性的「城池」，並一較長短。

由於人生的際遇不同，楊千鶴在台灣受完教育後，接著昭和 12 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再加上母親不贊成，因此沒有赴日留學，卻也沒有選擇一條傳統的路－婚姻。最後，她選擇了就業。在她第一個職業中，因為同工不同酬，使她毅然決然的離開。對日本人來說，同一份工作，日人薪水較高，是天經地義的事，久而久之，台灣人也視為理所當然，或者逆來順受。但楊千鶴意識到這種制度的不公平，並毫不猶疑地離開以示抗議，也為台灣人的

尊嚴提出最強烈的抗辯。這固然是因為她沒有家計的負擔，但面對殖民政權的不公，能用這樣的抗議方式，除了強大的自主意識與自信之外，其實也在於楊千鶴處理事情的方式，是感性多於理性。由此，也隱約可以看到她在人生中對抗政權的蠻橫時，一向充滿熱情與衝動，毫不妥協。也因此，在對抗中傷痕累累。

接下來的人生旅程中，她更進入了一個當時女性極少的工作領域，成為台灣第一位女記者。在日日新報社這看似開放的空間中，其實隱藏著男性與女性，以及日本女性與台灣女性不平等的空間劃分。在工作環境中受到種族、性別、階級的多重壓迫與宰制，殖民地女性的位階是最低的，楊千鶴一直在最邊陲的位置發聲。但她所找到的位置及發言的內容，在當時那樣的公共論述環境中，是有其意義的。楊千鶴總能非常努力於她的工作。透過她的工作，更進一步彰顯和實踐她的自主意識。

記者的工作，由於要常常離開台北去做訪問，並常有文友聚會，這種種經驗，增加了楊千鶴生命的廣度和力度。在她的同學在奶瓶、先生和婆婆之間打轉時，楊千鶴正在作訪問，這樣的生命經驗，拓寬了她的視野和身體的能動性。而記者的工作，讓楊千鶴對男性的工作領域不再陌生，在她後來進入男性的工作場域－政治中，也能無所畏懼，發揮所長。

婚姻對一位女性來說，是人生中重要的一環。楊千鶴在選擇婚姻後便離開職場，在婚姻中被迫失語，但這卻也使她由婚姻制度中有著深沉的反思，並努力從枷鎖中掙脫出來。

另一方面，許世賢因為母親的支持，讓她有機會到日本留學。所學習的領域－醫學，在當時也算是男性的領域。而在日本求學的過程中，更讓她見識到了所謂的民主與自由，這種在台灣付之闕如的東西。她常利用空暇時間去聽演說，吸收了許多民主的養分，也在那裡認識了三民主義，這對她日後加入國民黨不無關係。最後在日本拿到了醫學博士，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醫學博士。

幸運的是許世賢的婚姻對她的工作而言不但沒有負面的影響，相反的，有正面加分的作用<sup>1</sup>。回到台灣後，許世賢先在醫院工作，後來和夫婿一起開了順天堂醫院，這比楊千鶴幸運許多。醫師的工作領域比起記者是自由許多，也較不受歧視。女性醫師的社會地位高，受人尊敬。與女性所從事的其他行業相較，女醫生頗容易建立個人的職業空間。因此許世賢在職業上所感受到的歧視顯然比楊千鶴小許多。相對的，在行醫的過程，反而容易受尊敬並建立地方基礎。

最後，很特別的是，她們兩位原本都有自己的職業，卻因為不同的契機，卻產生了相同的結果，最後在國民黨時期，兩位女性獲得了日治時期婦女運動所爭取的參政權，並在參與政治活動中更進一步實現自己。只是，面對國

<sup>1</sup> 林山生先生在受訪時不斷強調沒有張進通就沒有許世賢，歐哲如，師大歷史所碩論，〈女性與政治－台灣新女性楊千鶴與許世賢之比較研究（1914-1983）〉，〈附錄三〉

家機器，她們有著不同的回應，而最後結果也截然不同。

在日治時代，楊千鶴雖然在政治上、民族上、性別上遇到不公平不正義之事，她常常能挺身而出，伸張正義。從學生時代開始，她便常常為台灣人喉舌。即便是在男人的工作場域中，在重重壓迫中，她即使處在最低的位階——一個殖民地女性，也都能勇敢的發聲，她的作品中突顯女性自覺與反思的性別意識、民族情感、日台差別待遇的議題，都屬於身處邊緣的女性抵抗強權支配壓迫者的表現。不過，和日本人的關係，有時很難一概而論。在對抗與衝突之外，也有一些妥協與合作。但不論如何，她在日治時期，總能以新女性之姿，在記者或作家的工作上發光。

反倒是到了戰後，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好不容易爭取到了參政權，應該是有為女性在政治方面施展身手的大好舞台。透過政治權力，讓她可以有更大機會實現自我，延續日治時期對婦女的關心。

楊千鶴參與政治的契機是民國 39 年（1950）台東縣議員的競選。有一名女性保障名額。當時憎恨惡勢力的年輕職員與反對派的人士說服討厭出風頭的楊千鶴的丈夫，讓楊千鶴能出來競選，以對抗地方惡勢力。她在後來的歲月中，稱當時的自己是「青睞不畏槍<sup>2</sup>」。當選後，主持正義，不畏強權的態度，使得那些國民黨人士將她視為欲除而後快的眼中釘。不僅如此，她要求召開一直未改選的全縣婦女大會，換下了不合適的婦女會長——縣長夫人。這件事得罪了無法爭取連任婦女會會長的縣長夫人，便與其丈夫警察科

---

<sup>2</sup> 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南天書局出版，1999 年 4 月初版，頁 264-

長策劃將楊千鶴和她丈夫驅離台東。本來還想進一步追討她由日本愛國婦女會接收的婦女財產。這些事在她後來的自傳中回憶起來，覺得自己對於國民黨迫害的無知，真是不經世故。

楊千鶴在對抗不公不義時，常是帶著衝動與強烈的熱情，說做就做。或許是文人性格使然，充滿了浪漫特質，有著敏銳的覺察力，感受不公便常會衝動行事。因此，在政治鬥爭中，便很容易敗下陣來。到晚年回首時，還覺得自己的善良熱情，對於殘酷的政治鬥爭來說，顯得有些天真與無知。不斷對抗粗暴政權的結果，惹來了先生的牢獄之災，完全改變了她的人生。面對父權式政權的宰制，除了繳械，別無他法。在政治手段的摧殘下，她拒絕了這個政府，也拒絕了她的語言，於是成了失聲的一代。並在後來的歲月中，始終背對國民黨。

反觀許世賢，在日治時期，受了高等教育，是屬於上層社會的一員。求學時代，面對日人不公的對待，她也都仗義執言。但，總的來說，在日治時期，許世賢和日本統治政權的關係，和諧多於衝突。

戰後，許世賢的參政則是由地方事務開始。民國 34 年（1945）11 月 19 日，嘉義市地方人士組成「地方自治協會」，以協助政府辦理接收。此協會剛剛成立，嘉義市婦女認為自治協會既為民眾參政的機構，應准許婦女參加。因此，十一月二十一日許世賢與許碧珊、賴麗渚、林秀媚、施月、郭碧梅五位婦女代表往晤陸兼市長公任，提出婦女應得參與協會運作的想法。其後，准由婦女界選出代表兩名，參加自治協會。其後由許世賢、許碧珊獲選

爲理事。當時省立中等學校校長、國校校長及教導主任，均由自治協會推薦人選，送政府聘請或委派，其中，許世賢爲嘉義女中校長。此外，許世賢亦爲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幹事，可見戰後初期她在地方即非常活躍。

雖然於民國 35 年（1946）3 月當選嘉義市參議員後即辭去嘉義女中校長一職，任職時間相當短暫，但是她一反日治時期的沉潛，開始積極參予公共事務。

許世賢積極參與婦女活動，於民國 35 年（1946）元月初，首先發起設立嘉義市婦女會，全台第一個婦女會終於正式成立，許世賢被推舉爲第一任理事長，也從此開始許世賢踏出參政的第一步。是年，許世賢代表嘉義市婦女會，參加台灣省婦女會成立大會並擔任執行委員。民國 40 年（1951），嘉義縣婦女會改組成立大會，許世賢被推爲理事長。當時婦女會與國民黨間的互動甚密，戰後初期的許世賢曾積極參加國民黨。從許世賢積極的參與各項地方活動並成爲代表來看，她確實頗具行政能力，對於公共事務也有相當企圖心或高度的興趣。因此，由她一路走來，步入政壇似乎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民國 35 年（1946），許世賢和邱鴛鴦當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開始正式步入政壇。

對許世賢來說，即使也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過避難的經驗，但仍然相信國民黨政權並爲之效力。終其一生，雖然也退黨，雖然也都能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但和國民黨始終維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雖然日後她和黨外許多理念較爲接近，但因爲對選舉策略和組織看法不同，也始終和黨外保持距

離，獨自經營。由此可以看出她的政治生態的適應能力。她和國民黨與黨外皆有一定交情，並在這夾縫中經營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她由戰後開始進入政壇，然後，終其一生，便沒有再離開過那個舞台，徹底的在政治的領域裡，實現自我和實現理想。更重要的，她還栽培了女兒接班，造成了嘉義的「許家班」，輪流在嘉義執政長達二十年。

由此可以看出，許世賢和楊千鶴有著截然不同的處事方式。她深沉、工謀略算計、有手腕，才能在那樣複雜的政治生態中，誰都不得罪。蠻橫的國民黨也欣賞她，新興的黨外勢力和她也頗有交情。而她在中間的模糊地帶，有著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左不右，立於不敗之地，並能高亢的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許，這和她學醫出身，理工背景有關。她的處事較楊千鶴理性、沉穩許多。也因此，她屹立在政壇近四十年，甚至還造成了「許家班」在嘉義執政二十年。這需要何等的政治智慧和手腕，絕不只是感情用事即可。

楊千鶴和許世賢有很類似的生命經驗，例如：來自於富裕的家庭，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在日本殖民時代都擁有好的工作以及一定的社會地位。進入國民黨統治時代，也最後都走上政治這條路。但是，她們也有很大的相異處，例如：在國民黨治權底下從政，結果卻相當不一樣，遭受政治迫害使得楊千鶴即使在戰後，也不願學習「國語」，以至於成為「失聲的一代」。而許世賢則一直和國民黨維持一定的關係。但不管怎麼說，她們有堅強的意志和自主意識，在與政權不斷的抗辯中不斷自我覺醒與堅持獨立自主，最後在強大的政權底下，不斷的彰顯其自我意識並努力於自我實現。

人類的力量何其渺小，常常只能在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想要勇敢反抗權力、社會習俗、或保有超越所處時代壓倒性思潮的真理或智慧，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為時代的非主流，常常要孤軍奮戰，但往往沒有聽眾，甚至成為眾矢之的，這需要何等的膽識與勇氣。本論文兩位女性所處的時代，充滿了限制和束縛。但是兩位女性都能把握一些時代所給的機會，在夾縫中找出一條生路。儘管路難走，但她們都能用智慧和勇氣殺出那個時代的重圍。

透過兩位不同領域的本土新女性的政治經驗，大致可以看出，她們有著類似的經歷，從日治到戰後，她們在政治、傳統的種種壓迫中，不斷追尋自我，使她們有了和傳統女性完全不一樣的人生。由本論文當中，我們看到新女性的主體意識如何在種種磨練、妥協與實踐中，尋求自我的實踐，展現強韌的生命力。並在新舊文化的交疊與禮教束縛中，尋找出脫的可能。在這過程，我們看到了女性的韌性與堅強的生命力。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兩個強權的時代，女性如何去實踐性別與族群的政治平等進而參政，而這樣的自主意識的養成過程又是如何。她們如何在日本殖民時代及國民黨時代，在政治的壓迫下，她們如何反應，如何抵制父權與殖民統治的雙重不平等，如何自我實現。戰後兩人都直接邁向參政之路，以期在政治的實踐中實現自我，並提升女權。從本文中，我們看到她們在女性主體的實踐與在不同角力場域中呈現的個人生命史，也見證了台灣新女性的發展史。